

本书题名《英汉语音对比研究》，核心词当然是“语音”，直译为英语似乎应该是pronunciation或者sound，但仅此无法涵盖所述内涵，这里的“语音”实际上是语音系统(sound system)的简称。在现代语言学意义上，语音研究包括音系学(phonology)和语音学(phonetics)，属于“两个不同层次却又有关联的范畴”(包智明等 2007: 16)，二者既相互交叉，又相互依赖。音系学关注语音系统，“主要研究语言里语音符号之间的功能关系，探索和揭示语音组合的结构规律和原则”(马秋武 2015: 11)，并为一些语音现象做出理论解释，而语音学研究可以为音系立论提供实证数据和客观依据。基于英语属于重音语言系统(stress language system)、汉语属于声调语言系统(tone language system)的学界共识，本书分别把重音和声调作为英语和汉语的音系类型，并以此为主线，对比二者在节奏类型、重音属性、音步模式、语调特征、声学表现、音节结构以及元音实现诸方面的异同点。

1.1 语音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人类通过语音载体实现信息交流的目的。语

言三要素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都很重要。至少，在许多语言学家眼里，语音应该享有与词汇和语法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Sapir (2002: 35) 认为，“经验证明，如果忽视形式和历史得以体现的语音，那么就不能充分了解语言的纯粹形式与历史进程”。英国著名语音学家 A. C. Gimson 特别强调了语音的重要性，“在讲任何一种语言时，必须掌握几乎 100% 的语音，但了解 50% — 90% 的语法和 1% 的词汇也许就够了”。如此说来，在一部收录数十万单词的词典中，如果我们能够熟练掌握 1% 的词汇并掌握基本的语法规则，无疑就能进行正常的口语交际了。但前提是，语音必须基本上准确，否则就会影响口语交际效果，甚至无法进行交流。

说到语音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Roach (2000: 3) 认为，“低层研究仅仅关心如何组织符合语法的句子，但高层研究需要深入了解语法理论以及相关的语言学领域”。“相关的语言学领域”当然应该包括语音方面的知识。因此，Sapir (1921) 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以及 Bloomfield (1933) 的《语言论》(*Language*) 均从语音开头，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1968) 的《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也是先讲音韵，而结构语言学和 Chomsky 的早期语言学只有音韵和语法两个部分。Quirk *et al.* (1985) 的《英语语法大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篇幅多达 1,779 页，其中多个章节结合语音谈语法，如第 18 章设专节讨论“韵律”，内容有 20 页之多。此外书尾附录 II 又有 20 多页专谈“重音、节奏和语调”。

国内不少学者也认为语音跟语法和词汇同等重要。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转引自江蓝生 2017)。邢福义先生提出语言的四个属性，几乎个个都与语音有关：1) 声音属性。没有声音的语言是语言的派生物或类同物，比如书面语言、计算机语言、体态语言。2) 信息属性。声

音是形式，信息是内容。没有任何信息的声音不成为语言。3) 系统属性。特定声音和特定信息的联系是相对稳定并且形成系统的，而不是杂乱无章和随时变动的。从静态看，声音和信息的联系形成语言稳定的符号系统。4) 群体属性。不同语言分属不同群体，并且反映群体的文化蕴含(转引自于根元等 1999: 117)。郭锦桴(1993: 1)的看法更是一语中的，“语言是以语音为自己的物质形式，离开了语音，语言便不能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语音是语言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命”。石锋先生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语音负载着包括语言体系在内的全部人类的社会交际内容，从生理、心理、物理，到语义、语法、语用，再到语气、情绪、情感。不论是学习一种语言，还是研究一种语言，都要从语音开始”(见梁磊、石锋 2015: i)。

谈到语音在语法中的地位，潘文国(1997: 147)认为，把语音和语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西方语言研究的传统。而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有其自身的传统，虽不关注语法，但也充分重视音韵研究的意义，并将它看作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关键处。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书没有一本是从音韵谈起的。偶尔有谈到音韵方面的内容，也都认为是修辞问题而被从语法中排挤出去”。语音与语法完全割裂的结果是，“语法的民族性研究失掉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因此，“在对比汉英语的语法、探索汉语的组织规律时，我们不得不正本清源，从根本的音韵问题讲起”(潘文国 1997: 148)。

语言之间的语音系统差异不容忽视。原因如19世纪德国著名语言学家Wilhelm von Humboldt所言，“语言之间的差异主要是通过语音形式构成的”(洪堡特 1997: 94)。Sapir谈得更详细，也更深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纯客观的特有语音系统，它只能通过悉心的语音分析才能获知，而这种系统的背后则是一种更受制约的“内部”或“理想”系统，天真的说话者或许难以洞察得到，但已经将它作为一

种既定模式，即心理机制嵌入他们的意识中。内部语音系统虽有可能被机械或无关的成分所掩盖，但仍是语言生命中一个真正而又至关重要的原则。在其语音内容久已变化之后，它可能会作为一个模式延续下去，包括语音成分的数量、关系和功能……每种语言的特征无不体现在理想的语音系统中，体现在深层的语音模式（人们可能称之为符号原子系统）中，一如体现在限定的语法结构中。语音结构和概念结构均显示出语言对形式的本能感觉。（Sapir 1921/2002: 45-46）

鉴于上述，“在进行两种语言对比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语音的对比，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学习一种语言的基础”（潘文国 1997: 150），也是研究一种语言的基础。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做到既知己，又知彼；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英汉语言系统具有不同的语音资源与基因。韩礼德（2007: 245）认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存在于汉语使用者意识中的基本语言单位就是语素、音节和汉字的组合体，而这一概念体现在现代汉语中就是‘字’”。对比可知，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顾明栋 2013）。英语词义的实现有赖于不同的发音，不仅单音节鲜有同样的发音，而且催生了将近90%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这为重轻对立的节奏模式提供了天然资源和指派规则。汉语除了连绵词外都是单音节，只有410多个音节的总量，加上声调指派也仅有大约1,300个音节。如此少量的音节总数实在难以满足话语交流的需要，但汉语依靠自身的资源，通过同音同调或异调而产生数以万计的汉字，且承载不同的意义，而载调音节（tone-bearing syllable）的组合也为双音节与多音节变调提供了无限的契机和相应规则。“字”不光是文字问题，而且也是语言问题（徐通锵 1994）。沈家煊（2017a）清晰地指出，西方语言和文字是“分立”关系，而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包含”关系，语言包含文字，文字也属于语言。Saussure（1983: 27）举证说，对汉语母语者来说，“书写的

字和口说的词，同样都是表意符号”，汉语方言之间虽然语音不同，但有“对应同一概念的词，而且由相同的书写符号所表征”。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尝试从脑海里去除文字，抹掉字形，那么我们会面临难以把握无序客体的风险，犹如游泳学习者突然给拿走了救生圈。我们需要一种替代人为辅助的自然物，但如果没有研究过该语言的语音，那就不能如愿以偿，因为没有书写符号，语音只是非常模糊的概念。（Saussure 1983: 32）

Saussure (1983: 34) 还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身的文字符号，也有固定而又区分清晰的语音库，正是这种语音系统才是语言学家关心的现实。不言而喻，英汉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字符号和语音系统。英语重语音，通过语音载义，这是一类系统；汉语轻语音，通过文字帮衬而载义，这又是一类系统。二者对语音的依赖程度的确存在差异，不过语音对比意味着为我们开启一个彼此相互了解的窗口，从而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语音对比研究可以为语法、词汇和语义的接口研究提供可靠依据，也可以丰富对比语言学的内涵，并有助于推进对比语言学乃至语言学研究的整体发展。而且，语音对比研究还能为更新英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1.2 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成果

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创始人当属赵元任。他是公认的语言学大师，又被尊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先生一生致力于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等领域的研究，内容涵盖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语音界面问题，其中不乏与英语的比较研究。他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

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2002)及其专著《汉语口语语法》(1968)等著述中,其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我国另一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于1947年撰写《中国人学英文》(1961年更名为《中国人学英语》)一书,内设专门章节比较英语语音和汉语语音的异同。在今天看来,吕先生的学术观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传承。

根据许高渝、王之光(2002)的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仅有两篇论文谈到英汉语音的音变、连读和重音等问题,另有两三本书也谈到英汉语音对比的内容。在此期间,罗常培、王均曾用“田恭”署名出版《语音学常识》,其中大多内容连载于《中国语文》。后经修订、增删更名为《普通语音学概要》,于1981年出版。该书运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主要结合汉语普通话的实际,并参照汉语其他方言,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汉语语音和音系方面的基本知识,其中引用不少英语例子。另外,高名凯、石安石(1963)合编的《语言学概论》也包含一些语音对比方面的内容,且有不少值得深思的观点。这两部著作都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其中不少章节对当下的语音及其对比研究仍有启示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出版了一些有关英语语音和汉语语音的著作和教材,由于较少涉及对比方面的内容,所以没有纳入本书综述范围。不过,王士元(2010)的《王士元语音学论文集》,林焘、王理嘉(1992)的《语音学教程》,郭锦桴(1993)的《综合语音学》,陈渊泉(Chen 2000)的《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模式》(*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吴洁敏、朱宏达(2001)的《汉语节律学》,刘俐李(2004)的《汉语声调论》等论著,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为汉语语音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大多涉及汉英语音对比方面的内容,而且不乏一些经典论述,值得我们借鉴和研读。吴宗济、林茂灿(1989)的《实验语音学概要》着重从生理、声学、感知三个维度分析了元音、辅音和声调的语音现象,介绍了轻重音实验和区别性特征。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语音学理论著作,为后来的语音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国内不少英汉或汉英对比的著述也讨论了语音对比方面的内容。譬如,许余龙(1992)的《对比语言学概论》(2002年更名为《对比语言学》)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理论与应用方面的专著,它为语言的微观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对比语言学理论框架以及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的英汉语音对比研究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外,《英汉比较语音学》(赵德梅 1995)、《生成音系学理论及其应用》(包智明等 1997)、《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王洪君 1999)、《汉语韵律句法学》(冯胜利 2000)、《英汉语调音系对比研究》(陈虎 2006)、《现代汉语节奏研究》(刘现强 2007)、《英语重音动态研究》(许曦明 2008)、《语音学与音系学导论》(许曦明、杨成虎 2011)、《英汉语节奏类型对比研究》(许希明 2018)等专著,分别以汉语和英语作为切入点,均对英汉语音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再者,《英汉对比语言学》(喻云根 1994)、《汉英应用对比概论》(熊文华 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潘文国 1997)、《汉英语言对比概论》(潘文国 2010)、《基础语言学教程》(徐通锵 2001)、《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何善芬 2002)、《英汉语比较导论》(魏志成 2003)、《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陈保亚 2015)等成果,均设专章或专节讨论了英汉或汉英语音的异同点。现在看来,无论是专著还是章节研究,作者都有自己的立论和比较方法,有的显得较为肤浅,甚至带有“生拉硬扯”的比附观;有的对英汉语音异同点进行了语言类型学方面的思考。

1975年,赵元任先生在83岁时发表经典论文《汉语词概念的节奏和结构》(Rhythm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word conceptions)¹。他明确提出汉语“以字为主、以词为辅”的观点,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话语出现大

1 原载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37-38期合刊,1975年第1-15页),1976年载入论文集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nwar S. D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75-292)。王洪君教授的汉译本《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叶蜷声校),刊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袁毓林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248页),后来收入吴宗济、赵新那主编的《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0-908页)。此外,许希明(2018)重译该文,详见《英汉语节奏类型对比研究》附录。

量的节奏单音调”，“由于大多数音节载有完整的声调”，因而“倾向于一种均匀的节奏”。基于此，王洪君(2004)将“均匀节奏”的双音节词看作等重型，而沈家煊、柯航(2014)则将“单音调”解释为“汉语语流里一个个音节本身就是一个个大致‘等音长’的节奏单位”。汉语虽有大量结合得很紧的多音组合，特别是双音组合，但是这些多音节在表达的时候仍然可以还原成一音节一顿的节奏。而且，沈家煊、柯航(2014)摆脱“二字+顿”这种基本音步的比附观，将“单字+顿”假设为汉语节奏的基本音步(primary foot)，它不是“蜕化音步”，而是未经充实或可充实的“虚松音步”；双音节(即二字)是“衍生音步”，是经过充实的“紧实音步”或“强势音步”。沈家煊(2017b)进一步指出，英语的节奏模式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而汉语的节奏模式是“单音|节”和“双音|节”，前者的“音节”指 syllable，后者的“节”指节奏单位(rhythm unit)。两类节奏单位可以概括为：英语双音节既是基本音步，又是标准音步，单音节不能独立成步，两个相邻的等重音节也不能构成一个合法音步。与此相反，汉语单音节可以组成一个基本音步，并衍生出双音节音步和多音节音步。这种英汉基本节奏单位的分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丰富了英汉语言对比的理论内涵，也为澄清汉语的词重音之争、节奏类型之争乃至“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提供了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发文讨论英语的音长均衡(许曦明 1994)以及重音和元音之间的动态变化(许曦明 1997)，前者将英语节奏中的音长音短看作一种互补的均衡关系，后者认为重音指派是元音变化的基础，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动态关系。经过多年积累，笔者于2008年出版专著《英语重音动态研究》，提出英汉节奏之间的两点主要差异：其一，英语节奏是一个重音观照下的动态系统，音节之间显示出重与轻、强与弱、长与短、清楚与模糊之间的对立，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表层结构上，而且隐含在深层结构中，因此英语母语者对重音十分敏感。其二，汉语话语中虽然也有轻重之别，但其节奏特征主要体现在声调的变化上。在声调的作用

下，音节配置的都是饱满元音，所以汉语母语者对声调非常敏感，对重音比较淡漠。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于2018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同名成果《英汉语节奏类型对比研究》，多位匿名评审专家给予较高评价。其中一位专家的评审意见是：第一，主要创新点在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选题以英语和汉语节奏类型的对比为切入点，对英汉语言节奏类型的异同进行了详尽比较，为语言学界研究节奏类型的特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思路。第二，主要研究特色包括：1) 成果旁征博引，参考了大量文献，展示了作者广泛的阅读量以及扎实的理论基础；2) 研究框架清晰，采用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思路，对比分析内容丰富；3) 论证详细，例证充分，从微观到宏观层面进行英汉节奏类型的探讨，具有较强的概括性。第三，主要建树体现在：1) 通过英汉语节奏类型的多维度对比，发现英语和汉语节奏变化的理据，即英语节奏是重音观照下的动态系统，而汉语节奏主要体现在声调的变化上；2) 发现英语的重音和汉语的声调虽然同属超音段音位，却隐含着不同的节奏类型；3) 发现英语和汉语不同的节奏属性：英语音步由重音驱动，汉语音步由声调决定。这种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了解英汉语言节奏方面的各自特点，无论对帮助中国人克服汉腔英语，还是帮助外国人避免洋腔汉语，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无论对中国英语教学，还是对对外汉语教学，都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1.3 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不足

回顾国内语言研究的现状，语音研究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境地。学术界虽在汉外对比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果(王菊泉 2017)，但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作为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的组成部分，英汉语音对比研究颇受冷落，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语言政策规划相对滞后，语言研究轻理

论重应用, 缺乏宏观的长远目标。二是国内语音研究基础薄弱且遭遇冷落。三是语音教学不重视, 课程设置亟待改进。从国内高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来看, 本科语音教学基本局限在纠音正音上, 至于音系学基础方面的系统学习, 大多在研究生阶段。还有不少高校因缺乏师资, 难以开设语音学与音系学这门课程。四是语音研究属于隐学, 概念抽象, 科研难做, 成果难产。诸多原因造成语音研究队伍人数少, 底子薄, 科研起步晚, 成果的整体质量偏低。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我国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总体水平, 而且制约着汉语词汇和语法的深入研究。

由于关注度不足, 汉外语音对比研究的产出成果极少。潘文国(2002a)的统计结果表明, 1977年至2001年间, 汉外对比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多达1,374篇, 其中涉及语音对比研究的论文有55篇, 仅占4%。2013年至2014年间, 在国内十家外语类主要期刊上发表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类论文中, 语音对比研究的论文仅占2%, 显得较为滞后(王文斌2017a)。其结果, 学术界对相关基础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与认识, 客观上误导了不少年轻学子。比如有的学者说, “英语次重音处在语流之中时和一般音节差别不大”, 这种表述显然模糊了英语次重音的节律性质与特征。其实, 次重音也是节律重音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节奏模式上起着重要作用(许希明2011)。有的把模糊央元音 /ə/ 配置给英语重读音节, 还有的提出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口语中要“发音正确, 吐字清楚”。但对英语节奏而言, “吐字清楚”未必“发音正确”。准确的发音应该是该清楚处(重读音节)必须清楚, 该模糊处(如轻读音节中大量的 /ə/ 音或成音节)也得模糊, 读得清楚反倒是错误的发音(许曦明2008: 201)。

根据许高渝、王之光(2002)以及叶爱、金立鑫(2017)的综述, 英汉语音对比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 超音段音位的对比研究尚待加强, 有关语调对比、节奏对比的成果较少, 深度也不够。2) 绝大多数成果属于描述性的定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不够, 而且局限于就事论事的分析, 缺乏举一反三的理论提升。3) 较少涉猎有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领域, 高

质量、原创性成果较少，在国际上影响不大。4) 语音实验研究成果较少，语音对比研究的数据分析尚待加强。5) 语音对比与词汇、语法、语用、修辞的接口研究成果偏少。6) 英汉语音对比的教师队伍存在“两张皮”问题，即外语院系只教中国学生英语语音，对外汉语教学只关注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发音，汉英/英汉两支对比研究队伍没有形成有机结合，难以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我们赞同上述学者的分析，可是为什么“高质量、原创性研究成果少”？为什么“描写性研究”多于“解释性研究”，而且缺乏“理论提升”，在国际上影响不大？笔者认为，症结之一在于学术界迄今未就汉语的节奏类型问题达成共识。只有澄清汉语的节奏类型，才能准确判断并认识其语音微观层面的问题。曾几何时，英语节奏的类型定位先后历经比附希腊语、拉丁语等强势语言的尴尬，学术界曾就英语的音量观、重音观和时间观产生很大争议。直到19世纪初，在重音被确立为英语的节奏支点之后，“英语的节奏研究立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刘现强 2007: 15-16），而且许多微观层面的问题都得到了合理解释。

实际上，汉语的传统韵律学早就把声母、韵母和声调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对于其中的精华部分，现代语言学似乎并没有深入挖掘和继承，使之不断发扬光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汉语普通话的节奏理论问题在美国音系学界开始得到重视（王洪君 1999/2008: 123）。研究的主力为海外一批华裔学者，他们运用生成语理论撰写出不少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对汉语音系的分析和解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马秋武 2006）。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改变了传统的观察视角，吸纳了西方研究的方法，而且在一些基本和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有的研究成果将汉语节奏比附在英语重音的音系类型上，淡化或者忽略了汉语作为声调语言系统的类型属性。这样的立论“没有摆脱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窠臼”（徐通锵 1994），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同时也造成英汉语音对比的明显失衡，致使对比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可靠基础。对此，张洪明（2014a）大声疾

呼，生成音系学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汉语来说，“音系学作为舶来之品，如何洋为中用”，这一追问应该引起汉语学界的反思。关键是，“既要钻得进去，更要跳得出来”，钻进去不易，跳出来更难(许希明 2018: 261)。

随着语音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研究成果运用实验数据进行论证，这种实证研究建立在较为客观的评价基础上，应该加以充分肯定。譬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音研究团队，以及石锋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汉语声调的数据分析，都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再如，马秋武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英语音系的深入解读，湖南大学陈晓楠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对英语重音的习得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近十年来，国内语音实验数据方面的对比成果确有明显增加，但有解释力的创新成果相对较少。研究者似乎存在一种误区，以为有了实验数据就可以做好语音或者语音对比方面的研究，这种想法有点儿简单化了。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框架不严谨，如有的英汉语音对比研究，其立论带有明显的英语眼光或汉语眼光，这可以看作“两张皮”的一种表现。二是文献阅读量偏少，或对所读文献一知半解，或者断章取义，甚至曲解原义。关键在于，实证数据研究必须与音系类型研究相结合，力求得到一以贯之的理论阐释。

1.4 英汉语音对比的类型观

半个世纪以来，音系共性观已经成为汉语韵律研究的主流声音，但不少研究成果并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原因如音系学的功能观所言，在承认人类语言普遍共性的同时，要兼顾语言的特殊性，因此音系研究要尊重具体语言的具体音系环境(汤朝菊 2015)。Hyman(2008)评述说，“音系共性”(phonological universal)的属性虽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一个结构或者相关的语音系统并不等于语音上的发音和声学属性。一种语言如果没有音系，就很难想象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朱晓农(2012: 39)指出，

“把所有人类语言的音系的结构关系归结为一些抽象规则，是可尊敬的学术理想。不过，在语音类型研究还没达到一定程度，这个长远理想只能看作是遥挂天边指引方向的北斗，而不能作为一种实际研究的路子”。

不少比附成果已经引起学界的很大分歧，而且造成汉语韵律研究处于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刘俐李(2007)称之为“‘各自为政’的零件式离散研究”，认为“能统摄全局的韵律理论因有分歧并缺乏系统操作性而难以指导实证性研究的深入，而实证性研究又因缺乏可供操作的理论指导而各自为政，难以自然整合形成攻关之势进而逼近汉语韵律实质”。问题的关键还是没有抓住汉语声调节奏类型这个“纲”，没有做到理论与事实的有机结合和有效对接。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转引自江蓝生 2017）。对比“要努力找好结合点”，否则就成了“机械照搬，‘食洋不化’，削足适履，亦步亦趋”（于根元等 1999: 269-270）。诚然，“要做到‘结合’，难度很大。结合，它不是国外的理论加汉语的例子，也不是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汉语，而是要参照国外语言理论的立论根据，从中吸取精神，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徐通锵 1994）。然而，“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吕叔湘 1990）¹。截至目前，比附已经造成“许多基本问题长期聚讼纷争，未成定论”，“这足以说明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观察尚未充分，尤其是汉语”（王文斌 2017b）。沈家煊(2017c)认为，“当一种舶来的理论应用于汉语，如果出现众说纷纭、各有一套，而且套数越弄越多、越弄越复杂的情形，就应该从根子上考虑一种简单的替代理论的可能性”。只有结合汉语事实，才能找准问题，并“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确切地说，借鉴西方的音系学理论，建立符合汉语自身韵律的理论体系，即明确汉语的声调音系类型，进而揭示英汉韵律之间的异同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 这是吕叔湘先生为《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杨自俭、李瑞华编, 1990,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题词。

早在20世纪20年代, Sapir(2002: 44-45)就提到不同语言之间的音系类型差异, 他举例说, 英语可能对相对重音非常敏感, 但对法语来说, 重音是非常次要的成分。再者, 语言口语中总有音高差异, 但在英语中并不影响词义, 也可能是随意的, 或者只是一种修辞现象。而在其他语言, 如瑞典语、立陶宛语、汉语、泰语和大多数非洲语言中, 音高差异可能分得很细, 且被认定为词本身的整合特征(integral characteristics)。这些语音系统具有不同的“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 它们“对彻底了解一种语言的语音本性(phonetic genius)同等重要, 甚至更加重要”。在今天看来, 所谓“语音系统”更多的是指音系学方面, 而不是语音学方面。虽然声调和重音的“类型区分是音系学的, 而非语音学的”(张洪明2014b), 但仍有研究者模糊乃至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线。

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 不少学者对英汉语音类型的差异还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譬如桂灿昆(1978)认为, “汉语属于断奏音, 就是说, 连续发出的各个音之间有间断。而英语却属于连奏音, 就是说, 连续出现的音圆滑无间断”。所谓“断奏音”实指声调指派的作用域为单音节, 所谓“连奏音”则指重音指派的作用域为多音节, 由此形成重读音节与轻读音节的交替往复。又如许余龙(1992: 94)将汉语声调称作“音节声调语”, 将斯堪的纳维亚语支的声调语言称作“词声调语”, 而且认为英语词重音的作用与汉语声调的作用有相似之处(许余龙1992: 97)。熊文华(1997: 79)设专节比较“汉语的声调和句重音与英语的语调和词重音”, 并区分了二者的相异点。潘文国(1997: 151)指出, “英语是音势敏感的语言, 而汉语是音高敏感的语言”。徐通锵(2001: 59)认为, 由声、韵、调组成的汉语音节形成一般所说的单音节语, 因而其“重音是音节间强弱对比的差异, 不是音节本身必须具备的特征”(徐通锵2001: 62)。上述学者展示出语音对比的类型观, 值得我们深思, 并用来指导当今的语音对比研究。

学术界已在形态类型和语序类型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包括语音类型在内的某些研究领域其成果则相对薄弱(金立鑫2011: 36)。不过最

近十年来,汉语学界已对汉语的音系类型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仍未达成共识,但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在国内语言学类重要期刊中,《当代语言学》适时译介了一些国外的学术论著,为国内学界开启了一扇获知相关信息的窗口,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其中不乏语音方面的成果。比如在2014年第3期中,由张洪明先生主持的“音系学理论与中国境内语言音系研究”专号刊发七篇论文,全都涉及汉语音系的前沿问题。其中《汉语声调和生成音系学理论》(包智明、曹枬文 2014)、《重音理论及汉语重音现象》(端木三 2014)、《韵律音系学与汉语韵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张洪明 2014b)等,均涉及汉语学界亟待澄清的问题。特别是汉语的重音、音步和韵律词的类型归属等,它们是统领语音微观研究的关键所在。相关论题虽说至今仍有分歧,但我们相信,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定能发现与汉语本质属性相契合的韵律类型,从而逐渐形成汉语学界的共识。

不可否认,汉语声调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但不少成果在分析声调时往往局限于其音高变化,有的成果甚至与英语语调的音高变化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声调不仅仅是超音段音位,而且还是“汉语母语者感知节奏的支点,一如重音是英语母语者感知节奏的支点”(许希明 2013)。这种看法与汉语归属声调语言系统、英语归属重音语言系统的分类相吻合,而且可以为解释汉腔英语和洋腔汉语现象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针对汉语的重音之争,许希明、沈家焯(2016)以重读的语用功能为视角,将重读假设为控制重音和声调的音层,指出重读虽是声调和重音的共享特征,但汉语的声调重读(tone-accent)型不同于英语的重音重读(stress-accent)型。重音和声调处在同一音层,作为各自音系的内部证据,均受位居较高音层重读的控制。重读充当话语组织的语用功能,可能与载重音节(stress-bearing syllable)和载调音节相重叠,并作用于词层突显。同时,他们指出了英语词重音的节律结构及其组合特征以及汉语词声调的音高特征及其聚合机制,并考察了重音指派给英语多音节词,声调指派给汉语单音节字的对应依据。这一观点结合汉语实际,立论有据,不仅有助于

深化研究者对英语重音和汉语声调的认识，而且为语法、语义和语用的语音接口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1.5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1.5.1 研究内容

第一章首先讨论英汉语音对比的重要性，然后回顾我国40年来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现状，在肯定学术成果的同时，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二章以结构音系学和生成音系学为切入点，简要考察语音对比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然后介绍沈家焯(2017c)的比较法与比附法，倡导“能简则简”和“分清主次”的比较法，力戒“过度生成”与“以偏概全”的比附法。

第三章在区分重音可预测、重读不可预测的基础上，力求阐明不同层次的重音问题，即将重读假设为控制英语载重单位和汉语载调单位的音层，形成其间的相互重叠，既可区分词层节奏模式，也可彰显话语组织的语用突显。另外，将重音和声调设定为同一层级，作为英汉语言的“内部系统”或“内部证据”，可以预测；将重读分析为外部证据，不可预测。由此形成英语“重音重读”型与汉语“声调重读”型的音系差异。

第四章对比了英语与汉语之间的节奏类型差异。在英语归属重音定时型的基础上，提出汉语的声调节奏类型，作为音节定时型的亚类或补充。然后对比分析英语的词重音规则与汉语的词声调规则，依据是前者的多音节域资源及其节奏机制，后者的单音节域基础及其节奏理据。最后考察重音与声调分别承载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

第五章首先讨论包括词重音和节奏重音在内的英语节律音步，然后回顾学术界关于“莫拉音步观”“音节音步观”“松紧音步观”“声调音步观”的争议，进而分析汉语音步难以定义的症结所在。比较而言，英语音步与

词重音息息相关，易于整合为重轻交替的节律音步，但汉语载调音节在组字成词时难以形成始终如一的节律结构。关键在于，英语节律音步以双音节作为基本音步，汉语声调音步以单音节作为基本音步。组字成词的韵律模式以等重式为基础，然后产生右重式和左重式。

第六章通过对比显示，汉语语调单位以单音节调为基础，英语语调单位以多音节调为基础。由于汉语字调的制约，加上语调的影响，致使调型变化更趋复杂。作为两种语言的内部证据，重音和声调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语调的表现。英语体现为调核突显与信息焦点分布的复杂性，其间的互动关系既有节律规则上的制约，又有语法、语义和语用上的互动。汉语展示出声调与语调的相互交织，形成“小波浪跨在大波浪上的关系”，当然也会受到语用重读的影响。比较而言，英语语调表现为起讫点的音高变化，汉语语调显示出起讫点的音阶变化，二者的语调差异均与各自的音系类型密切相关。

第七章对比英汉声学上的异同点，两种语言都有音强、音高、音长方面的声学特征，但表现程度不同。音强是英语重音的本质属性，而音高则是重音与重读的叠加互补效应。相反，音强在汉语声调表现上极弱，而音高则是其本质属性，由此形成声调与重读的互动关系。因此，汉语母语者在英语习得中时常伴有“重音盲点”的困惑，而英语母语者在学说汉语时总有“声调盲点”的困惑，由此说明英汉音系类型差异在二语习得中均有超音段音位的“盲点”问题。

第八章的音节对比显示出英语音节的复杂性与汉语音节的简洁性。英语的多音节组合与重音指派相辅相成，自然产生词重音，同时为重轻音节的交替模式提供了契机。汉语的单音节性与声调指派自然对接，产生字调，由此生成较为复杂的词层变调规则。英语的多音节性与重音指派息息相关，汉语的单音节性与声调指派密不可分，从音节这个枢纽节点入手，有助于廓清两种音系类型的微观差异。

第九章通过英汉元音对比显示，载重音节和载调音节催生饱满元音，

非重音音节和轻声音节孕育弱化元音。元音从饱满到弱化乃至省略，其间是一个音变连续体。在节律重音的作用下，英语产生大量的弱化元音，大约占到元音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声调的作用下，大约90%的音节配置饱满元音，轻声音节及其衍生的弱化元音数量极少。英汉元音的差异说明，重音指派和元音变异以及声调指派与音值变化，均在动态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且隐含着音变连续体的哲学理据。

第十章提出语音对比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1.5.2 研究方法

本书按照纵向线索和横向线索的思路展开研究。纵向线索指英汉语各自的节奏类型及其音系变化，横向线索指两种节奏类型之间的音系差异与对比。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点，力求找出关联，发现规律；列举典型实例，注重理论思考，结合静态描述，重在动态解释，进而抽象出一种结构清晰的理论框架。本书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用的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综合与分析相结合、描述与解释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进行考察，以确保论证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使用定性方法搜集语料，从中发现或同或异的语音形式变化，然后据此验证初始的理论框架。

通常，语音教科书大多先讨论元音、辅音和音节结构，然后再考察重音、声调和语调之类的超音段音位。本书重点以英汉音系类型为主线，首先将英语的重音语言系统、汉语的声调语言系统作为切入点，然后再围绕两种音系类型逐步展开讨论，最后再对语调结构、声学表现、音节结构以及元音实现进行对比分析。在这种意义上，英语重音和汉语声调以及较高音层的重读和语调均对语音实现产生统领作用，由此体现语音对比的动态视角，并彰显本书意在强调的音系类型观。